

# 政社协同视角下义乌女性社会组织的治理效能研究—— 基于四个典型组织的实证分析

张少侠

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浙江义乌，322000；

**摘要：**本研究以政社协同理论为框架，实证考察义乌四个典型女性社会组织。依托市场女性从业者占比 65% 的结构，形成“党建引领、项目驱动、资源整合、数字赋能”的协同模式，在商贸服务等领域成效显著，但面临行政化依赖、治理不完善、人资短缺、数字化不足等挑战。研究从四维度提出对策，建议通过构建市场化机制等提升效能，为共同富裕示范区基层女性社会组织治理跃升提供“义乌样本”，对丰富政社协同理论有重要价值。

**关键词：**政社协同；女性社会组织；社会治理；治理效能

**DOI：**10.64216/3080-1494.25.12.101

在我国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基层社会组织是政府治理的重要协同力量。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提升社会治理效能”<sup>[1]</sup>，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对健全社会治理体系又作出专门部署，为基层社会组织发展提供了政策指引。在这一背景下，女性社会组织兼具性别优势和专业能力，在凝聚女性力量、服务弱势群体、参与公共事务等方面的独特作用日益凸显，其治理效能提升成为实践与学术领域的重要议题。

## 1 义乌市女性社会组织的治理生态与实践现状

### 1.1 组织生态与治理模式概述

义乌市女性社会组织已形成覆盖商贸服务、权益保护、纠纷调解和经济发展全领域的组织生态体系。通过对四个典型组织的考察发现，其参与社会治理呈现出“党建引领、妇联牵头、社会协同”的鲜明特征，构建了“党建引领、项目驱动、资源整合、数字赋能”的政社协同治理模式。在党建引领方面，各组织普遍建立党组织，确保治理方向与党政工作同频共振；项目驱动上，通过公益创投、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实现服务的专业化与可持续化；资源整合层面，构建“妇联搭台、部门联动、社会参与”的资源网络；数字赋能方面，依托“和睦 e 家”等平台提升治理精准度与效率。

### 1.2 典型组织治理实践分析

#### 1.2.1 中国小商品城妇联：商贸领域的“她力量”标杆

中国小商品城妇联前身为 1997 年妇委会，2012 年升格为妇联组织，2025 年完成第三届换届，形成覆盖商贸全领域的“市场—楼层—商户”三级体系，服务 20 余

万从业者中 65% 的女性群体，60 名班子成员中党员占比 23.7%，构建“支部建在市场上”的党建格局。其立足商贸特色，形成“数字赋能+品牌出海+社会公益”服务架构：2025 年开展 AI 技术、跨境电商培训 40 余场，联合复旦大学建“巾帼智库”，带动直播销售额 10 亿元；2024 年组织赴“一带一路”国家参展，推动出口订单超 2000 万元。

#### 1.2.2 义乌市微芒妇女儿童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基层维权的“柔性屏障”

微芒妇女儿童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2018 年注册成立，2025 年纳入义乌市妇联公益创投重点项目，形成专业化、项目化服务体系。该中心有 30 名志愿者及专业团队，与浙江省第四人民医院建立医社合作，构建“心理干预+法律支持+社会服务”多维网络，核心服务聚焦反家暴与妇儿权益保护，包括每周回访 200 余户家庭、开展“义心卫她”活动，2024 年联合培养调解人才 41 人，2025 年参与专项行动服务千余人次。

#### 1.2.3 义乌市“商姐”调解队伍：商贸纠纷的“巾帼仲裁者”

义乌市“商姐”调解队伍 2015 年起源，2024 年规模扩至 41 人并建立妇联组织，2025 年纳入“妇联+司法”多元调解体系，形成专业化纠纷化解队伍。成员以市场女经营户、女翻译为主，80% 具备外语能力，构建“纠纷化解+法治服务+能力建设”体系，2024 年调处经济纠纷 118 起，挽回损失 1821 万元，调解成功率超 90%，并开展法治宣传、法律援助及专业培训。2025 年获评义乌市平安建设先进集体，经验入《义乌市基层社会治理白皮书》，为优化营商环境提供支撑。

#### 1.2.4 义乌市女企业家协会：经济发展的“巾帼引擎”

义乌市女企业家协会 2010 年成立，2025 年会员达 282 名，其中 30 余人任省、市“两代表一委员”，定位“经济发展助推器+社会治理参与者”，2025 年设“巾帼科创圆桌会”推动产学研合作。其核心功能涵盖创业扶持、品牌拓展与公益责任：2025 年联合开展电商培训，培育女性创业者 500 余人，带动就业 10400 人；2024 年组织“出海精锐部队团”参展，促成出口订单超 2000 万元；设“康乃馨基金”累计捐助 150 万元，带动 2000 名妇女参与来料加工。

### 2 义乌市女性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结构性挑战

#### 2.1 行政化依赖与组织自主性困境

义乌市女性社会组织的发展普遍带有行政推动痕迹，行政化依赖严重制约组织自主性。中国小商品城妇联 2012 年升格为妇联组织后，项目设置深度对接政府“品牌出海”政策，2024 年赴俄罗斯、迪拜参展本质上是执行政府商贸推广任务，而非自主市场行为。“商姐”调解队伍被纳入“妇联+司法”体系后，常被调度参与卫生清扫、活动秩序维护等非专业性事务，导致组织功能偏离专业定位。微芒中心 2025 年承接的“义心卫她”项目需严格遵循民政局指标，每周 200 户家庭回访的频次和内容均由政府设定，自主调整空间有限。女企业家协会 2024 年“出海精锐部队团”参展活动中，43%的会员参与动因是“响应政府号召”，反映出组织活动对行政指令的路径依赖。这种行政化倾向导致组织在资源获取、项目设计上缺乏自主性，难以灵活响应市场和社会需求。

#### 2.2 内部治理结构与自主发展能力短板

义乌女性社会组织普遍存在“重执行、轻决策”的治理短板。中国小商品城妇联 60 名班子成员中仅 23.7% 为党员，理事会在“巾帼智库”等品牌项目的战略规划中参与度不足，更多承担政策传达角色。“商姐”调解队伍 41 名成员中 80% 为市场经营户兼职，2025 年接受司法局培训时仅 3 人具备专业调解资质，导致“共享法庭”在涉外纠纷处理中专业深度不足。微芒中心 2024 年联合司法局开展的“商姐”调解员培训，课程设置完全依据政府普法指标，缺乏对社会组织实际需求的调研。女企业家协会“巾帼科创圆桌会”因过度依赖政府提供的产学研资源，在项目选题上优先响应政策导向，而非企业技术创新的真实需求。这种“政策驱动型”发展模式，导致组织难以形成自主造血能力。

#### 2.3 专业人才与资金结构的双重约束

专业人才短缺问题在各组织中普遍存在：“商姐”调解队伍中仅 3 人拥有专业调解资质，2024 年 118 起纠纷中有 12 起因专业能力不足转为司法诉讼；微芒中心 30 名志愿者中，具备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质的仅 1 人，2025 年开展的 200 人次心理赋能服务中，85% 为基础情绪疏导，缺乏专业创伤干预服务。资金结构失衡加剧了组织发展困境：中国小商品城妇联 2025 年 AI 技术培训经费 54.7% 来自政府专项拨款，社会捐赠仅占 15.5%，课程仅覆盖市场 10% 的女性经营户；女企业家协会“康乃馨基金”累计捐助 150 万元中，80% 来自会员企业摊派，社会募资占比不足 5%。这种“人才匮乏-服务低效-筹资困难”的恶性循环，严重制约了组织发展。

#### 2.4 数字化治理与协同机制的现实瓶颈

数字赋能是基层治理现代化的核心引擎，而协同机制是打破部门壁垒的制度纽带。<sup>[2]</sup>在数字赋能方面，除微芒中心外，其他组织的数字化应用仍停留在初级阶段。中国小商品城妇联直播销售额 10 亿元中，仅有 15% 通过自有数字化平台转化，缺乏用户数据自主管理能力。“商姐”调解队伍尚未建立纠纷数据台账，2024 年 118 起案件的调解成功率统计仍依赖人工汇总。跨部门协同机制的碎片化问题显著：女企业家协会对接政府“品牌出海”政策时，需分别与多部门沟通，2024 年赴迪拜参展因部门审批流程繁琐，导致 3 家企业错过展会报名期限；微芒中心与浙江省第四人民医院的合作仅停留在项目层面，未建立常态化数据共享机制，难以实现对重点家庭的持续跟踪干预。这种协同壁垒制约了治理整体效能。

### 3 政社协同视角下的治理优化对策

#### 3.1 政府层面：构建市场化协作机制，释放组织自治活力

政府需从“指令型管理”转向“伙伴型治理”，建立与女性社会组织的平等合作关系，通过细化购买服务目录、设立专项孵化基金构建可持续的合作支撑机制。

细化购买服务目录：参照微芒妇女儿童服务中心“义心卫她”项目的标准化运作，将“商姐”调解队伍的涉外纠纷调处纳入政府购买服务体系，按案件标的额梯度设定补贴标准，建立“服务质量-资金拨付”的动态调整机制。

设立专项孵化基金：按年度财政预算一定比例设立女性社会组织发展基金，重点支持微芒中心创伤干预技术研发和“Y 娘姨”调解项目升级，参照女企业家协会“康乃馨基金”的市场化运作模式，建立“政府引导+社会资本+项目孵化”的可持续投入机制。

#### 3.2 社会层面：完善多元赋能体系，强化共治生态

社会各界应共同努力,为协会发展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构建多元支持体系。针对专业能力不足与公信力薄弱的双重困境,构建“专业认证与审计+公众监督与知情”的社会化支持网络。

**第三方能力认证与监督:**联合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建立“巾帼服务认证中心”,对微芒中心具备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质的志愿者及“商姐”调解队伍中的持证调解员实施年度考核,考核合格者纳入政府采购优先选择名单;同步组建由法律专家、公益领域学者及公众代表构成的第三方评估委员会,每年对中国小商品城妇联等典型女性社会组织的财务收支状况、项目实施成效开展独立审计,并公开审计报告,强化外部监督与公信力建设。

**数字化透明平台建设:**将“和睦e家”平台功能延伸至中国小商品城妇联,要求其公开AI培训覆盖群体中部分女性经营户的转化数据,以及女企业家协会“出海”参展促成的出口订单明细;依托区块链技术构建可追溯的服务记录体系,实现组织服务过程的全程留痕与成效数据的可验证,提升治理过程的透明度与数据可信度。

### 3.3 妇联层面:优化枢纽型治理架构,提升专业服务效能

新时期妇联组织经过改革,“由纵向的、具有科层制特征的封闭组织体系向开放、动态、灵活的组织网络演进”<sup>[3]</sup>。妇联组织作为联系政府和基层女性社会组织的桥梁和纽带,应充分发挥枢纽作用,为协会发展提供全方位的支持。

**组织网络整合:**以妇联为核心、骨干组织为支撑、基层组织为外围,将“商姐”调解队伍纳入婚姻家庭纠纷三级调解网络,推动中国小商品城妇联下属妇委会与微芒中心建立项目协作机制,实现“红粉连心”服务日与反家暴宣传的资源整合,短期内形成覆盖全市乡镇的女性社会组织服务网络,构建层级清晰、协同高效的服务体系。

**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在女企业家协会会员群体中推行“支部建在项目上”模式,将“三八红旗手”评选与“巾帼科创圆桌会”的产学研成效挂钩,考核指标涵盖带动一定数量女性创业者就业、促成若干个校企合作项目等具体成果,通过量化与质性结合的评价导向,强化政治引领与业务发展的协同性,实现党建工作与组织

服务效能的深度耦合。

### 3.4 女性社会组织自身层面:实施能力再造工程,增强内生发展动力

动态能力理论认为,组织内生能力的系统性重构是应对环境不确定性、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核心路径。<sup>[4]</sup>女性社会组织自身应着力加强能力建设,提升自主发展水平,具体而言,需针对治理结构松散、数字化水平低等问题实施系统性提升。

**数字化转型行动:**“商姐”调解队伍需建立历史纠纷的数字化台账,实现调解成功率、当事人满意度等核心指标的实时动态监测,通过数据沉淀提升纠纷预判与处理效能;中国小商品城妇联应着力提升自有平台直播转化效能,开发用户画像系统以精准优化培训内容供给,全面增强数字治理与服务能力。

**品牌化运营战略:**微芒中心可将“义心卫她”项目升级为涵盖“心理评估+法律援助+就业帮扶”的全链条服务体系,形成闭环式服务生态;女企业家协会需深化“巾帼共富工坊”品牌建设,每年孵化若干“来料加工”标准化项目,通过构建“服务收费+社会捐赠+政府购买”的多元资金结构,逐步降低对单一资金来源的依赖,增强品牌可持续发展能力。

###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人民日报,2022-10-26(01).
- [2] 夏雪,洪向华.数字技术赋能基层治理的三重逻辑[J].山东行政学院学报,2025(03):79-87.
- [3] 王晓莉,高端阳.妇女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思想演进与核心问题[J].科学社会主义,2023(04):88-95.
- [4] 简兆权,邓凌云,陈冰儿.数字化领导力、知识管理能力与企业商业模式创新——环境动态性的调节作用[J].科技进步与对策,2025.07.02:1-11.(网络首发)

作者简介:张少侠(1992-),男,硕士研究生,甘肃庆阳人,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讲师;研究方向:社会治理、职业教育。

基金项目:2025年义乌市社会科学联合会项目“功能互补视角下女性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现代化路径研究”项目编号:YWSK25045)阶段性成果。